

目 录

莫 雄	我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回忆	1
华克之	对辛亥英雄莫雄后半生的点滴 回忆	34
籍瑞三等	抗战期间共产党在高树勋部的 工作	37
梁葛然	抗战期间在重庆做地下工作的 回忆	55
之 辛	回忆友邦伯伯	69
李时雨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卧轨斗 争和南下示威运动	81
庄国英	从泰国到延安	98
向 明	我的早期活动	109
王景瑞	崂山烽火	120
蹇先任	三八年留苏纪事	130

人 物

唐棣华	爱国男儿热血多	148
	——唐克烈士传略	
王超北	民主革命的勇士	166
	——忆西北护国军总司令高峻	

日 记

范船僧	北伐军进军江右实录	174
-----	-----------------	-----

综 合 资 料

袁 伟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始末	212
-----	-------------------	-----

来函摘登与启事五则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226
罗 云 吴瑞武		227
熊步成		229
吴健人		232
启 事		232

我与中国共产党 合作的回忆

莫 雄



当年的莫雄

莫雄同志（一八九一——一九八〇）是广东省英德县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拥护孙先生的三大政策。莫雄同志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他在国民党内资格老、交游广，人称“莫大哥”。他自一九三二年在上海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后，一直冒着危险暗中帮助党、帮助革命。

解放后，他曾任广东省政协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广东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们转载《广州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的这篇文章，不仅有较高史料价值，还可使读者了解到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上，除了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在关心革命，不惜以他们的身家性命，财产帮助革命，从而更进一步认识党的统一

战线政策的英明和伟大。

本文在《广州文史资料》刊出后，莫三球同志提出了几处更正意见，已作为注解加入文中。转载时，本刊有删节。

——编者

开始做朋友

一九二八年，张发奎为李济深所反击，退出广州，投靠蒋介石。不久，又在湖北宜昌反蒋，旋即失败，逃抵广西，联合李宗仁，出师东下，企图夺取广州。抵达广州近郊白云山附近时，张部有两个师为蒋介石收买，阵前倒戈，李、张联军溃败，逃返广西。

我当时任张部新编薛岳第二师第三团团长。出发进攻广州前，奉张命到广东组织“别动军”，张、李兵败，我立即遣散别动军，也回到广西。

一九三〇年底，我感到跟随张发奎没有什么出路，便跑到上海，见到宋子文。当时宋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他给我以财政部视察的职务。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上海战云弥漫。蒋介石却忙于屠杀革命人民，国民党人大都拜倒蒋介石脚下，但也有人坚决反蒋的，如何香凝、邓演达等。

我的财政部视察，是一个挂名领干薪的官儿，终日闲荡，恰好碰到旧部刘哑佛。他是安徽合肥人，一九二五年我任建国粤军第十一师师长时，由同盟会会员金维复等介绍认识的。当时我见他头脑新颖，思想进步，就委他做我师的政治部主任。但共事不到一个月，我师为蒋介石所缴械，便分开了。这次上海重逢，欣然道故，十分高兴。从此他常到我寓所闲谈，并介绍严希纯（解

放后任全国计量局局长）、项与年（真名梁明德，解放后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华克之以及袁良邹、何文凤、莫钺等同志与我往来。我感到他们朝气蓬勃、有崇高的理想和渊博的学问，内心拜服。他们向我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详细经过，还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当前形势讲给我知道。我真是顿开茅塞，对他们更加敬重，互相之间，情感更笃。他们知道我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请我设法保释几个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我愿为之奔走，便去找当时上海警察局长文鸿恩。文与我素有交情，在我请求和劝说下，便把几个在狱的共产党员释放了。刘哑佛等很表感谢。我当时非常倾慕共产党，极想参加党，请严希纯作介绍人。严请示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李克农。李叫严转告我：“莫先生是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想参加共产党，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不参加党为好。今后，对党有利的事，望莫先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共产党，能做到这样，我们就十分满意了。”我听后，觉得有道理，表示同意。

上海抗战

我在上海（一九三〇——一九三四）还接触到一帮“政学系”人物，首脑是杨永泰，其中还有国民党实力分子，如海军司令李根源、陕西都督李震华、贵州省长吴鼎昌，另外还有一批留日学生张群等。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早与我认识。杨在上海见到我时，曾拿出他的《削藩论》给我看。这篇《削藩论》是日本大臣伊藤博文献给日本天皇的一部著作，杨将之改头换面作为自

己的著作。他把当时各地方军阀矛盾冲突的情况研究分析后，提出外交上倒张作霖，政治上倒汪精卫，军事上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上倒张发奎、李宗仁，以蒋介石一统天下为张本的策略。这叫“四大纲要”，以此献给蒋介石。蒋视为至宝，立即委杨为侍从室秘书长，从此杨得到蒋的宠爱。杨为了炫耀自己，又表示对我尊重，特意给我看这个《削藩论》。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抗战开始了。一天深夜，宋子文派他的亲信陆文澜、张海安用小汽车来接我，宋说要我接张远南的税警总团第三团团长职务。这个第三团实力雄厚，有四、五千人，其中有两千广东兵，干部都是张发奎的第四军旧部。见了宋，我说现在正在打仗，阵前撤换军官不好，表示可以在税警总团做个参议，若第三团有战事，可到那里指挥。宋子文同意了。我到徐家汇税警总团驻地时，总团长王赓便交待部属以后听我的，自己将机密文件和地图统统交给我，旋即收拾行李，作远走状。我很惊异，即问：“这是干什么？”王说要去美大使馆看同学，边走又悄悄说：“莫大哥，你这次来，真是太好机会了。”我不解其意，他神秘地一笑，又说：“过两天你就知道了。”以后我才明白，王赓极怕和日本人打仗，我来了他可以开溜，怪不得说是“太好机会了”。

两天后，王赓穿着笔挺的黑色西装，误入已被日军占领，改为日军司令部的英国礼查饭店，被日军拘捕了。第二天，上海的日本报纸就用特大标题报道“阵前俘虏国民党将军王赓”，并将王照片附在报上。宋子文得知此事，大发雷霆，通过各国外交团体，费了很多手脚，才把王赓弄了出来。宋将他申斥一顿，送进监狱。王入狱后，宋子文把我提升为税警总团长。我上任后，马

上通知上海正在抗战中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等，同时派税警团第二团在庙行阵地抗击日军。两星期后，在一次战斗中，该团利用麻包作为掩体，向日军进攻。日军用重炮集中轰击，不到两个钟头该团阵地全毁，死伤七百余人。我指挥士兵继续作战。当年放映一部记录片《中华光荣史》，便有我骑马指挥作战的一些镜头。

不久，日军在浏河登陆，直插十九路军后方，该军总指挥蒋光鼐不得已宣布全线转移。税警总团被指定驻在淞江、青浦。抗战部队撤下以后，蒋介石立即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蒋介石投降卖国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宋子文“反蒋”

上海停战以后，税警总团进驻海州。此处为有名的“淮盐”产地。但盐枭为患已有百年。他们勾结地方豪强、贪污官吏，破坏盐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匪首白宝山，当过北洋军阀的师长，与我相识。他有二万多人，拥有轻、重机枪和其他武器。他与上海青洪帮头子杜月笙和国民党中央大员孙科等人均有勾结，势力很大，曾把驻在那里的中央军独立第六师（师长王若周）逼走，独霸一方。我向宋子文建议，把这盐枭肃清，以利税收，宋答应了。我又考虑他们有孙科等背景，怕清剿会招致“越权”的责难，便电报蒋介石，说明此处匪患情况与清剿意见，请求委我以剿匪之责，蒋接电后，正式委我为“淮徐地区剿匪总司令”。

一九三二年九月，我把盐枭据点全部攻下，捉到匪头目及不法官吏（其中包括县长，县公安局长等）八十余人，匪首白宝山

逃走了。我决定把这些匪盗问斩，在行刑前，接到孙科（行政院长）和杜月笙的电报，请求我释放几个头目。我虽与孙、杜有交情，但我还是把他们一律杀掉，复电孙、杜，谓接电过迟，已经把他们杀了。从此淮徐地区安静，税收由每年十几万元突增至八百万元。我受到“传令嘉奖”，海州百姓也为我立碑称颂。

税警总团从此名气大了，宋子文这时已经有独树一帜与蒋抗衡取而代之的企图。美国也想用亲美的宋子文代替降日的蒋介石，积极支持宋子文。宋乃大量扩充税警团，使整个编制膨胀到三个师的兵力，全部美式装备，还有九个德国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税警总团下辖五个团，每团足五千人。排的编制为十八个班，每班配有轻机一挺，每排又有一个六〇炮班。总团直属的还有高炮、山炮、特务、通讯、运输、卫生等七个直属营。每个团还有一个手枪连。宋子文按照美国旨意，准备打起“倒蒋抗日”旗号，由美国供应五百架飞机，各方面大事扩充。这时我奉宋子文之命在苏北云台山下修建大型飞机场。不久，宋子文要我去欧洲“考察军事”，税警总团团长由过去做过总团长的温应星接任。宋给我五千元大洋作置装费，要我很快启程。但等了多日，没有消息，护照也未拿来。找宋询问，宋装作忘记，反劝我不要急，要我先与陈济棠、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系，以为将来反蒋之计。我知宋的用心，一则要我将税警总团交回其心腹温应星，二则利用我与当时反蒋的杂牌部队联系。我答应为他效力。是年冬，宋几次秘密往返北平，与在北平的张学良密商，决计联合反蒋。宋命令温应星把驻陇海铁路以东的几万名税警总团兵士乘火车开赴北平，用“请蒋下野，以清君侧”的名义反蒋。但几万部队行动，目标极大，引起在郑州的河南省主席刘峙的注意。

刘问温应星此行奉谁命令？温答奉宋之命。刘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在保定忙于剿共的蒋介石，蒋急令温：“没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任何部队不得私自调动。你部火速返原驻地待命。”蒋又对沿线部队下令作战斗准备。温见势不妙，只好将部队带回海州。过了数日，蒋探知宋子文与张学良“联合倒蒋”计划，心中大怒，但不敢深责宋、张。因宋掌握蒋的经济命脉，又有美国作后台；张学良拥有几十万东北军，各有力量。蒋只找宋、张宣讲了一番“先安内，后攘外”的理论。宋、张也因事情败露，无可奈何，分别“出洋考察”去了。宋子文委托我联系各方面的事，还没有来得及做，一场反蒋计划便告终了。

牯岭会议

一九三三年十月，我在上海闲居无聊，到江西南昌去找薛岳，薛当时任江西剿共部队第二路军总指挥。早在广东驱逐龙济光时期，我与薛已认识，他对我极客气，招待我住在南昌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办事处内。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百花洲花园遇到杨永泰。杨见到我十分高兴，即邀我到 he 家里，在他家见到陈布雷、陈方子、罗坤强等八名他的机要秘书，我也是认识他们的。杨要我住在他家，这个家就是他的办事处，他在二楼办公，从不让别人进去，但任我自由出入。我又在此住了约一个月。一天，杨亲热地与我谈话，说知道我向与蒋介石很好，表示愿意替我向蒋“搭线”，说现在江西分区成立剿共保安司令部及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要我担任专员。过了两天，杨带来蒋介石给我的委任状和组织表，一份是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委任状，一份是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

员委任状。再看两份组织表，都是空白的。我说：“畅公（杨别号）！承你介绍，让我当上了这两个官，可是怎么一个人也不给我呵？”杨永泰笑着说：“我一个人都不介绍给你，你自己去找吧！”言下之意，是对我极大信任。他还递了一张五千元大洋支票给我，说是“蒋委员长亲自批的”。当我走出杨永泰住宅时，心理很不平静。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把官送到手里，还把钱送来，蒋、杨为什么如此厚待我呢？无非是想我为他们卖命而已。五千元就能收买我吗？若是依了他们，屠杀共产党，屠杀工农，我岂不成了孙中山的叛徒？这正是我深恶痛绝之事。何不趁这机会，让共产党来当这个剿共保安司令的家呢？于是我立刻到上海，找到严希纯、刘哑佛、华克之等几个共产党员朋友，将两份委任状及组织表交给他们看，并告知经过。我说：“我相信孙中山三大政策，这是可以救国兴邦的。蒋介石反共剿共是要亡国的。我对你们很佩服，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呢？”严、刘等人听后，互相对看一下，没有立刻说话。我见状，便更加明确地说：“你们不讲，让我讲。我要用蒋介石的拳头打他自己，你们把这两份东西拿回去和上级商量研究，假如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党员来与我一同干！”他们听罢，十分高兴。严希纯把我的委任状和两份组织表带走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底，我的江西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以及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班子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组成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由胡毅、陈修爵担任，参谋长卢志英（又名卢涛，一九四八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情报参谋项与年，情报组长贾绍谊（又名贾作），专署主任秘书刘哑佛，专署文教科科长阮退之，主任科员薛代旦（曾任中共广东顺德县县委第一书

记，组织被破坏后逃到上海），科员丘镛（烈士），科长傅肖先（解放后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人。他们都是中共上海党组织研究后派来的。组织表上介绍的几十名同志，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除了项与年、刘哑佛两人外，其余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他们很快就到江西就任。其中陈修爵副司令不知什么原因，很快又由上海地下党调走了。我到任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拨三个保安团给我。这个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和行政专员公署设在江西德安。这地方位于南浔铁路中段，按蒋介石说法，这里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我就任后，在司令部下秘密活动的党组织马上与当地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在共产党的巧妙安排下，我的“剿共”部队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了几仗。结果是“击溃”红军，“消灭”了当地苏维埃政权。不到六个月，在我所辖的地区共军已“绝迹”了。事实上红军部队抽身转移到别处打敌人，苏维埃政权转入地下。我将“剿共”捷报不断送蒋介石，蒋派人调查，认为“属实”，非常高兴。给我以“通报表扬”、“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蒋介石对我也不是完全放心的，他派一个南昌行营的军统特务谢也夫到我司令部及专署内任联络长官。这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他到德安后，抓到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这位女党员坚贞不屈，宁死不向敌人投降，一天晚上用蚊帐布搓成绳索系在梁上自杀身死。对这狠毒的特务谢也夫，我司令部及专署的共产党员都分外警惕。刘哑佛则主动与谢也夫周旋，经常好酒好菜去请他，并投其所好和他谈天说地，吟诗作对。刘哑佛俨然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谢看不出什么可疑之处，遂解除了对刘的疑心。同时谢也夫知道我和蒋介石、杨永泰的交情，因而也不敢怎样放

肆。只是常在司令部及专署行来踱去，使人生厌。

我在专署，一切工作均交由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办理，做得十分干净利落，其他的党员我也与之接触。项、刘等常同我讨论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分析当前形势和世界各国与苏联的情况。上海的严希纯不时到我司令部作客，与刘哑佛、卢志英等秘密开会，并与我会晤。他往来于南昌、南京之间，非常忙碌。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蒋介石通知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各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等到庐山牯岭开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绝密会议，我因“剿共有功”、“考成第一”而被蒋介石特邀参加。会议是在极端森严和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蒋亲自主持会议。具体事项由蒋南昌行营秘书长、行营第二厅厅长杨永泰负责。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策划和部署第五次“围剿”的进一步行动。这次行动命名为“铁桶围剿”，是由法西斯德国顾问提出来的。计划用一百五十万大军，采用突然包围的方法，包围以瑞金为中心，半径为三百华里的革命根据地。地图上划分了编了号的格子。每个参加行动的部队、单位，在何时必须到达地图上某个格子所标明的位置都很明确。到达后马上布铁丝网，构筑火力网及碉堡等，一俟包围圈完成后，便按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一点七华里左右。每推进一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十华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位置要使得它们的火力能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火网。计划每月向纵深地带进迫五十华里，六个月围到红都瑞金。那时瑞金四周将有三百重铁丝网，三十重碉堡线。每道铁丝网之间的防守，也要求十分坚固，要设立大量碉堡群、地雷阵。如情况变化，则用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调运

部队。“围剿”中的火力布置、粮草、交通、电讯、医疗、药物、弹药等都有详细的部署。在包围未组成以前，派十二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时间；包围圈形成后，这十二个师随即撤离。事实上，在会议前几个月已开始准备这次行动。德安一带运来大量铁丝网，各个部队装备大加改善，美制军用卡车一千辆也已运到。

会议文件很多，足有三、四斤重，内有包围表、计划书、指示命令等几十份，还有蒋介石的语录、指示汇编及其他小册子，文件上都打有蓝色的“极秘密”印记，并按名单编了号码。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结束时，蒋介石致闭幕词，向与会者打气，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面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决策，毕其功于一役”等等。在场的二百多反共军事头子，个个气势汹汹，纷纷发誓要在这次铁桶围剿中“剿灭”红军。

散会后，我返回德安保安司令部，征尘满面来不及洗，便召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到办公室，屏退卫兵，关上房门，把文件给他们看。他们飞快地看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完。三人交换了眼色后，刘哑佛问我：“大哥！你想怎么办？”我说：“还怎么办？这样危急，你们马上拿去送上党中央。”他们一齐站了起来，几乎是同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您！”他们的话，引起我心头一阵激动。随后他们即指定项与年将这些绝密文件送到南昌我保安司令部后方办事处，找到几个精干的年轻的地下党员，将文件的主要部份全部密写抄录并马上以电报发给党中央。抄录的密写文件再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送中央苏区。两个星期以后，党中央率领的红军开始了轰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后来项与年在外地不幸被捕，他为了保护我，没有说出是我的参谋。经过地下党千方百计营救，他越狱逃跑了，用砖头磕掉四个门牙，化装为乞丐，经过重重封锁，历尽艰险，历几个月时间才跑到延安。

红军过毕节

红军长征离开江西以后。一九三五年三月某日，我忽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马上乘飞机到贵阳。我当时以为将庐山会议文件送共产党中央的秘密已经败露，又想到项与年一去不返，莫非他出事了？心中犹豫不决，便找刘哑佛商量，问他：“此行是凶是吉？”刘想了一下，便笑着说：“若是我们事情暴露，蒋介石知道了，用不着叫你到贵阳，他可以叫你到省城开会，把你抓起来。大哥，你放心去吧！”我到南昌，蒋介石的座机正等着我，飞到汉口加油时，一群军统特务借口运送重要物资占用我这架飞机，我斗不过他们，只好让他们飞走了。但我怎么到贵阳呢？南昌行营参谋处长晏勋南劝我找五省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借飞机。张慷慨答应把他的飞机借给我，于是我到了贵阳见到蒋介石。原来蒋要我担任贵州毕节剿共保安司令及督察专员，去堵截长征中的红军；并负责进剿留在那里的几千名红军伤病员及掉队的红军。蒋配给我六十三师整个师，叫我指挥。我接受了命令，把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和督察专署的原班人马都带到贵州毕节，把熊式辉派的三个保安团交还了他。

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过去曾在各种宴会上见薛岳对我称“大哥”，很是恭敬，以为我来头不小，对我颇为顺从。贵州毕

毕节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之地。据情报，这地区果真有七、八千红军的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如果让陈光中去对付这些伤病员，那么他们处境就危险了。我心里十分焦急，好在刘哑佛、卢志英抓住了陈光中极爱女色的特性，整日用酒灌他，并且真的给他找到两个漂亮女子做“小老婆”。陈光中沉溺于酒色之中，约每隔五天左右，就请我和卢志英、刘哑佛去赴宴，早将“剿共”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了。我当然也不给他发什么指示，不予过问。这时蒋介石给红军牵着鼻子走，东奔西扑。过了半年，毕节红军伤病员也不知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在毕节，常到“贵州才子”周培艺（又名周素园）家中坐谈。周是一个绅士，家藏书画极多。我与他纵谈古今，探讨各种问题。我常把共产党人对我讲的道理和他讲，他认为我对政治理论很有研究，表示敬佩。那时贺龙、肖克率数万红军将到毕节，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污蔑红军，当地百姓纷纷逃离，周也准备逃走。我劝他：“周先生！我认为你不必相信那些谣言。共产党是讲道理的，是爱护百姓的。你不要走，待红军到了，你就说是莫雄叫你留下的。”周培艺相信我的话，留了下来。不久红军到来，对于周的不走，认为稀奇。某部政治部负责干部去见他，周说是莫雄叫我不走的。红军政治部干部对这位周培艺很好，和他深谈起来，对他讲了不少道理。周对共产党十分好感，表示要跟随红军长征，红军也欢迎他。因他年纪大，还用轿子抬他走路，历尽困难，到了延安。后经党的批准，一九四二年回到贵阳，还写信给我，备述中共的伟大正确，革命一定成功等等。解放后他被选为贵州省副省长，这是后话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陈光中师调离毕节。贺龙、肖克等率部

开向毕节。我把部队撤到毕节城外十多里的山沟。红军派一个参谋送给我一信，内云：“莫雄先生：你是我们革命老前辈，现在我们组织‘反蒋民主联军’，李济深先生也已加入。我们一致公推你老先生为黔军总司令。”签名的有贺龙、肖克、夏曦等九人，并署名红军军事委员会。我接此信后，不知如何是好。我专署及保安司令部官佐职员合起来，只有几百人，加上彝族的警政大队三百人，也不够一千，枪械又陈旧，要就任这黔军总司令，在我看来是开玩笑的。于是我向这位红军参谋说：“你们二、三天内就要开走，你们一走，我不是成了无兵司令？要是你们不走，让我当个排长也可以。烦你转告贺龙将军，以后日子还长，我还可以帮你们的。”过两三天后，红军过了毕节，蒋介石知道我部对红军一枪不发，让红军过境，勃然大怒，命令把我扣押。后来我获悉，扣押我另一个原因是因我曾托回上海去的专署主任参谋共产党员黄贻书（上海地下党派来我专署的），带信去找李怀诚（这是我在上海认识的共产党员），打听我的老朋友华克之的下落。不料李怀诚参加了暗杀汪精卫的活动，正在被追捕。黄贻书到李怀诚家，中了埋伏。被捕后，在黄的衣袋内搜出了我给李怀诚的信。于是我便有了“通共”及“暗杀”的嫌疑，被押送南京军法处关了起来。据狱官说，这间监房，是当年蒋介石关押邓演达的。我悼念邓的死而又想到自己也不能幸免，对蒋介石极为愤恨。我被关了一百五十天，却没有被提审，我想也许是由于杨永泰出力的原因。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被张发奎、薛岳、陈诚保了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是杨永泰叫他们保释的。这次保释，正值两广闹“独立讨蒋”。杨永泰见机会已到，便向张发奎、陈诚说：“你们以前

常说要保莫大哥出来，但他有通共的罪名，这一点委员长最忌恨的，提出来只会令莫大哥更不好过。现在两广搞独立，正是保释的好机会，你们可到委员长面前说莫大哥在两广很有名望，保他出来到两广策反，军前效力，立功赎罪，这样便公私两全了。”张、陈依言而行，果然奏效。我出狱后，蒋介石召我去谈话，蒋一见我劈头就问：“你身边为什么总有共产党？”我暗自吃惊，但我坦然地说：“没有这回事。”蒋瞪着我：“哼！没有？你专员公署主任参谋姓黄的，他都承认是共产党了！他是谁介绍给你的？”我着实有点惊慌。但事已如此，只得顶着说：“哪有人介绍？是他自己找我来的，他以前曾是陈炯明粤军中的一个主任参谋，和我同事，所以用他。”这是我随口编出来的。蒋见我应答如流，说出来的关系又是十多年前的，他无法追查，只是气咻咻地说：“哼！你还不知道共产党吗？他们是很厉害的，无孔不入，知道吗？”我见蒋语气转为缓和，便乘势说：“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嘛！知道怎敢用他呢？”蒋点头说：“你以后要注意，千万不能这样了。”我说：“请委员长放心，我以后留意。”蒋训斥完了，便对我说：“你现在跟陈（诚）参谋长到两广搞策反，带罪立功，要多立些功。”蒋随后委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叫我到汉口找陈诚去两广进行“策反”，并给我八千元现款。迨我由上海到香港时，闻余汉谋已投蒋，率部进入广州，陈济棠逃香港，白崇禧逃回广西，也不用我去“策反”了。

两广统一后，蒋到了广州。有一天蒋召见我，对我说：“现在广东收复了，你还是干你的行政专员好吗？”他故意不提兼任保安司令。我说：“我力不胜任，不能当。”蒋忙说：“不！你以前在江西当得不错嘛！”我说：“委员长！确实我不愿当官。